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二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5 3/4 字数126,000

一九八〇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八〇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00

统一书号: 11072·71

定 价: 0.56 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 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十五周年 ·

“一二·九”运动在天津廖永武(1)

一九三五年至抗战爆发前后党领导下的

天津学生救国运动李启华(27)

参加天津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回忆 ……………王绶昌(37)

回忆抗战前深入农村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徐达本(49)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通俗剧团……………黄 沙(54)

回忆“一二·九”运动中天津妇女救亡工作

..... 陈 晶 安 琳 (60)

回忆女同学会抗日救亡活动 黄 哲 (68)

“一二·九”运动回忆片断（四篇）

..... 朱光 王刚 于瑞英 朱缙章(71)

✱

反动学生组织诚社始末胡梦华(89)

吉鴻昌立“懲前毖后碑”事略刘大有(122)

孙良诚从军始末及投敌经过……………傅二虞(125)

天津篮球运动发展小史李清安等(147)-

忆当年南开“五虎”鏖战南北王锡良(158)

誉满中外体坛的利生体育用品厂李清安 韩馨远(171)

订正·补充.....(178)

补	记天津妇女救国会 (59) 抬棺示威游行与郭
白	清 (121) 旧中国的历届全国运动会 (146) 天津
	早期的小学体育运动 (157)

“一二·九”运动在天津

廖永武

从《塘沽协定》谈起——“一二·一八”大示威——平津南下宣传团——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总罢课——“五·二八”大示威——工厂和郊区救亡运动的开展——展开反走私的斗争——争取二十九军，支援绥远抗战——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伟大抗日战争爆发了

“一二·九”运动到现在已经四十五年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这一段历史，对于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实现新时期的任务，都有现实意义。

从《塘沽协定》谈起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我国东北进行大规模侵略。在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的政策下，很快就把我国东三省断送给日本。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又制造了一系列挑衅事件，并唆使便衣匪徒在天津制造暴乱。从一九三二年初至一九三三年三月，日本侵略者先后占领了山海关、承德等地，逼临长城各口，形成包围平津的形势。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南京国民党政府步步屈膝投降，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使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合法化，并划冀东为“非武装区”，为日本侵略者进一步侵略华北提供条件。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一九三四年四月十

七日，日本外务省又发表了企图独占中国的声明，公然叫嚣日本是亚洲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中国不得与日本以外的任何国家发生关系。国民党政府竟厚颜无耻地发表声明说：中国“从无欲中伤任何他国之意，更无扰乱东亚和平之念。”完全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

一九三五年五月，日本侵略者又借口所谓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进入滦东“非武装区”是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控制华北的无理要求，并由关外调集日军至关内。六月，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秘密会谈，全部答应了日方的无理要求，签订了《何梅协定》，规定：中国政府取消在河北省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一切中国军队（包括宪兵三团在内），撤换日方指明的军、政人员和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至此，国民党政府将华北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统治权，完全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

《何梅协定》签订后，日军源源涌入关内，日本驻天津司令动辄以“采用武力处理”威胁国民党政府，还声称：“华北一旦发生自治运动，日本愿意援助。”不久，“华北自治”的傀儡戏粉墨登场。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日军一面在北宁、津浦线举行“秋季大会操”，一面策动汉奸冒充“农民”突袭香河县城（即“香河事件”）。过几天，日本侵略者便宣布这些“农民”都是华北“自治”的“先驱”。十一月十一日，在天津的日本报纸发表“华北民众自治促进会”成立，其目的是“促进中日提携，……厉行冀、鲁、晋、察、绥五省自治”。天津市长程克首先响应，通电称：“窃观大势所趋，恐难俯顺輿情，无以挽狂澜于既倒。”汉奸卖国的嘴脸完全暴露无遗。

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收买的汉奸、毒犯、流氓在天津大

闹“自治”丑剧，天津街头出现“自治请愿团”，伪称“国民代表”，坐着汽车，由日租界跑了出来“示威”。从此，“自治运动”的队伍，经常出现在街头，甚至袭击国民党政府机关。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策动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为了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十二月十六日批准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遴选”宋哲元为委员长。

华北危亡，迫在眉睫！天津人民更是首当其冲。因此，天津人民迫切要求抗日。早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当共产党人吉鸿昌团结抗日将领冯玉祥等在张家口组织察绥抗日同盟军时，党曾发动天津工人和学生到张家口参加抗日军队，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九三四年党又在华北发动了民族武装自卫运动，成立了“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并在同年十二月召开了天津武装自卫代表会，推动反日运动的开展。天津地下党还秘密发行了《实话报》，向广大群众分析了华北民族危机的深重，提出：“武装保卫华北”和“挽救华北危亡”的号召。党还发动工人开展没收日货的斗争，通过斗争，成立了“工人齐心会”、“穷联”等工人的组织。在各校，通过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教育，以及组织华北问题讨论会等活动，扩大了党的影响，发展了“保卫国土同乡会”、“反帝大同盟”等党的外围组织。

正在这时，党中央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出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全国同胞团结一致，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号召。红军到达陕北后，又分别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抗日救国宣言》，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使天津人民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出路。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平津十个学校^①的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揭露了反动统治者的黑暗，指出莫都南京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要求国民党政府“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

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

“一二·一八”大示威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禁令，举行了英勇的抗日救国大示威。十二月十六日，北平学生又举行了规模更大的爱国示威运动。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学生立即响应，于十二月十八日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怒潮。

这一天的上午九时，天津学生组成两支游行队伍：一支由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等校组成，他们在出发前，召开了大会，提出：“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全国团结，一致抗日”；队伍出发后，汇合了中西女中和汇文中学的一部分同学，途经南马路、东南城角、东马路，到达金钢桥南边。一支由法商学院出发，路经天津师范学院、扶轮中学、震中中学、工业学院等校，汇合成更为雄壮的队伍，举着“天津学生请愿团”的大布旗，到国民党市政府请愿，推代表要求面见市长。市长不敢出来见学生，由

^① 私立北平汇文中学、私立北平贝满女子中学、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私立北平燕京大学、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私立天津中西女子中学、私立天津汇文中学等校。

秘书孙某出来接见，孙某对学生所提出反对“防共自治”，动员全国抗战，人民有言论、结社、集会自由等要求不予答复，充分暴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卖国求荣，仇视革命人民的反动面目。

当请愿代表向全体学生报告交涉经过时，学生们怒不可遏，立即举行游行示威。

南北两支队伍正准备汇合时，遭到杀气腾腾的军警所排成的一堵人墙所阻挡。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欢迎爱国警士们和我们一致要求抗日！”经过数度冲锋和反复搏斗，许多学生虽然被军警打伤，但士气愈来愈旺，在统一指挥下，两支队伍一声呐喊，南北夹击，终于冲破了反动军警的阻拦和堵击而胜利会师，沿官银号，东马路，进东门，出南门，一路上举行浩浩荡荡的抗日大示威。学生们群情激愤，斗志昂扬，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喊出了天津人民数年来被抑制在心坎上的挽救国难的呼声。

游行队伍在预定地点——南开操场召开全市学生大会，宣布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并发表了抗日宣言和通电，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允许集会、结社自由等。大会还决定十九日举行总罢课。

“一二·一八”大示威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恐怖气氛，提高了群众的抗日觉悟，揭开了天津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一页。

就在“一二·一八”游行示威的当天晚上，南开中学的学生决定南下请愿。他们齐赴天津西站，打算乘火车到南京，遭到反动当局的阻拦，不准上车。他们便决定徒步南下，走到杨柳青后，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又返回天津。第一次请愿无结果。

回津后，经数日准备，并吸取上次失败的教训，决定分批化装成各种职业青年南下，有的乘火车直达南京，有的搭轮船到上海再转南京，于一九三五年年底在南京会合。

请愿团首先派代表见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这位秘书长态度蛮横，不讲道理；他们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请愿，又被王世杰“训”了一顿，叫学生“莫谈国事”。因此，代表们决定到南京各校开展宣传活动，阐述华北目前局势，使南方的同学更加了解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北方人民，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一九三六年元旦，请愿的同学晋谒中山陵，在中山灵前吐诉了他们的爱国衷曲。

经过一个月的奔波，请愿团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却教育了广大青年，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是出卖中国，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罪魁祸首。在这以前，很多同学对国民党的南京政府仍抱有幻想，认为北方的军阀政客是民族败类，南京政府是会同情人民的抗日要求。如今认识到，不管是北方军阀官僚，或者是南方的达官贵人，原来都是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压力的投降派。要想救中国，必须另找出路。

平津南下宣传团

经过示威运动以后，学生的抗日救亡情绪高涨起来。如何把学生运动引向新的高潮，这是当时学生运动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关键时刻，党即时指出：单纯的学生运动是不能完成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伟大任务的。必须扩大抗日救亡宣传，发动千百万工农群众起来进行武装的自卫斗争，才能使救亡运动发展、壮大。

在北平“一二·一六”示威后的一个星期，天津学联派代

表慰问受反动当局殴打致伤的北平同学，并举行了慰问大会。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成立的平津学生联合会上，根据党提出的“到农村去”、“到工厂中去”的号召，决定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民间，宣传抗日救国。

宣传团分四个团（北平三个、天津一个），北平方面：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出发，一、二团奔丰台绕南苑，经黄村、青云店等地向固安进发；第三团经芦沟桥、长辛店、安次、永清奔固安。天津方面，由于军警的破坏，市内各校没能按原计划出发，只有北洋、法商、汇文、南开几个学校少数同学于一月二日由天津出发，经汉沟至杨村，沿途作了大规模的宣传，晚至皇后店，受到当地农民和小学教师的热烈欢迎。次日，召开群众大会，群众情绪激昂，连警察听了也表示同情。四日，向安次进发，安次县长拒绝学生入城，并对学生进行恐吓威胁，要他们回校上课。经说理斗争始允许进城，在西关小学住宿。五日在安次郊区作抗日宣传，六日至永清，整队出发宣传，七日至固安。八日，四个团在固安城外汇合。固安城门紧闭，不让学生进城，国民党的便衣侦探百般恐吓学生，污蔑爱国学生为“土匪”。同学们对敌人的进攻毫不退缩，一面进行抗日宣传，一面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城里的许多居民和学生把钱、粮和棉被用绳子传送过城墙，支援宣传团员们。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给了同学们极大的鼓舞。四个团还在固安县城北关的一个大车店里开了平津学联南下扩大宣传团全体大会，会上各党支部态度鲜明，托派在讨论宣言时，从中捣乱，终以绝大多数同学拥护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响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号召，最后通过了一个积极抗日的宣言。

大会之后，学生分化了，继续留在宣传团的人数大大减

少。天津同学走完全程到北平的仅十二人，当时编成一个分队参加到北京大学、师范大学为主的第三团；另外，北平的一、二团还保持，只是人数也大大减少了。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宣传团没能完全实现原计划。历时近一个月，冒着严寒，徒步跋涉七百里，通过与广大农民的初步接触，提高了觉悟，了解了农村生活和剥削压迫的关系，体验到：要担当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的巨大使命，必须深入工农群众，把抗日爱国的种子散播到工农群众中去。

平津学生回来后，经过二十多天的筹备组织和酝酿之后，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它是党团结各阶层爱国青年进行抗日救亡斗争的核心。民先队发表的成立宣言，提出了斗争纲领，要求每个队员站在最前线，参加一切救亡斗争。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不顾一切牺牲，不畏缩不后退，发扬每个队员的先锋精神；与各种救亡团体取得紧密联系，一致行动；把握现实，分析研究民族革命的理论与现实；学习军事技术与理论，促进民众自卫运动。

在党的领导下，民先队发展很快，在一年内，天津发展队员六百余人，负责人前期为李哲人同志，后期为杜文敏同志。全国队员达六、七千人。它对当时及以后的抗日爱国斗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为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学生运动的发展与深入，引起国民党蒋介石的极端恐惧。为了扑灭抗日救亡的烈火，蒋介石政府开始在全国，首先在平津镇压学生爱国运动。

“一二·一八”示威后，天津的一些进步学生被开除。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旬，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取缔平津学联。二月一日，反动军警包围了北洋工学院，逮捕爱国学生数十人，许多

学生被打伤。反动当局还派军警特务监视学生的行动。但是，反动当局的逮捕和监禁吓不倒爱国的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天津学联通过报刊揭露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向社会伸张正义。他们还团结进步教授和社会名流，取得他们的支持。不久，被捕学生便陆续被释放出来。

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

为了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党中央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央的决议，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奠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

刘少奇同志根据党中央的委派，从陕北出发，长途跋涉，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到达天津，主持中共北方局的工作。刘少奇同志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河北省的具体情况，批判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从理论上、策略上、工作方式方法上给予北方党全体同志以具体的指导。刘少奇同志曾用陶尚行、尚陶、凯风、K·V、吕文、能、实、莫文华等笔名在北方局机关刊物《火线》和省委机关刊物《长城》（后改名为《国防》、《中国人》、《人民之友》等）以及公开的刊物，先后发表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文章，来扭转过去北方党内存在的错误观点。一九三六年四月十日刘少奇同志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批判了党内一些有“左”倾思想的同志，在具体工作中不懂得利用敌人的矛盾反击敌人，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抗日朋友，单枪匹马的和敌人拚命；不懂得公开

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既破坏了秘密工作，又妨害了公开工作；不了解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联系等等；详尽地阐述了毛主席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指出：在当前阶级关系变化的新形势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要求在具体斗争中掌握客观形势，使白区的党走出狭小圈子，更广泛地团结群众，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及领导艺术。这篇文献的发表有力地提高全党的策略思想水平，使许多党员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给党造成的危害，促进了天津党的工作路线的转变，积极进行恢复和整顿组织的工作，加强对党员的秘密工作教育，把党的组织隐蔽在公开或半公开的群众组织之中，领导群众进行合法的斗争，使天津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广泛地开展起来。

这期间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起来，一九三六年四月，平津学联改为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不久，天津学联也更名为天津学生救国联合会。以下层劳动群众为基础的天津民众救国联合会建立起来了，郊区农民建立了农民救国会。天津的妇女在张秀岩同志领导下也建立了妇女救国会、女同学会。在这些群众团体的基础上，建立了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由党的主要领导人李楚离同志以及教育界的杨秀峰、新闻界的罗隆基、妇女界的张洁清、学联的王绶昌、银行界的周科微、实业界的于啸秋等组成。从此，形成了全民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这期间学生运动的斗争形式灵活多样。当时，党领导各校学生开展对当前局势的讨论，提高学生们的思想觉悟。以进步青年为骨干的“海风社”，以诗歌为武器，投入救亡运动。《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五月的鲜花》等救亡歌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在市区街头、在民教馆、在郊外的村庄，

许多学校的进步学生组成剧团和演出队，向群众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黎明》等话剧、街头剧，深深地教育和感动了群众。

四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总罢课

中国的学生运动，得到世界学生的同情和声援。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南开大学学生会接到“世界保障和平自由及文化联合会”由巴黎寄来的信，内称：一九三六年二月底于布鲁塞尔召开的有二十三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国际青年会议，决定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九日为世界青年援助中国学生周，号召全世界各国的大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日本的侵略，援助中国学生为了争取民族独立的行动！”

当天晚上，由南开大学学生会提议，召开天津学联执委紧急会议，决议推派代表赴北平与北平同学联系，共同行动，还决定次日（二十二日）召开天津学联代表大会。

二十二日，代表大会如期举行，参加的学校有：北洋工学院、法商学院、女师学院、河北工学院、南开大学及扶轮、汇文、南中、觉民、商职、律师、水产、广东、中西各中学，共十七校。大会通过了以下决议：①响应全世界学生的罢课运动，自二十三日起罢课三天；②罢课期间举行被反动当局殴打致死的北平学生郭清追悼会，到农村扩大宣传，召开各校同学座谈会。

二十三日，天津学生实现总罢课。许多学校张贴大标语：“响应世界学生反战反法西斯和平周！”“反对反共协定！”“民众武装起来对日作战！”这一天，鉴于北平学生追悼郭清抬棺游行与警察冲突的教训，为了避免反动当局的破坏，天津举行的郭清追悼会是在各校分别召开的。通过追悼会，激发了群众抗日救亡的情绪，加强斗争的信心。

罢课的第二天，天津学联在北洋工学院礼堂举行各校学生座谈会，讨论的中心议题是：“中国学生运动对民族解放之使命及其前途的发展”，通过讨论，大家共同认识到：要完成民族解放的斗争，必先成立民众抗日的联合战线，学运必须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在罢课期间，学联组织学生宣传队回家乡——农村，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活动，他们拟定的宣传大纲是：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为；②华北目前的新危机；③农民贫困的原因；④农民的出路。这次宣传活动取得了积极效果，回来后决定把宣传队伍长期保存下来。

这次罢课斗争，使每个同学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危机以及自己所肩负的伟大使命，从而使学联更加巩固，更加广泛地团结了广大同学共同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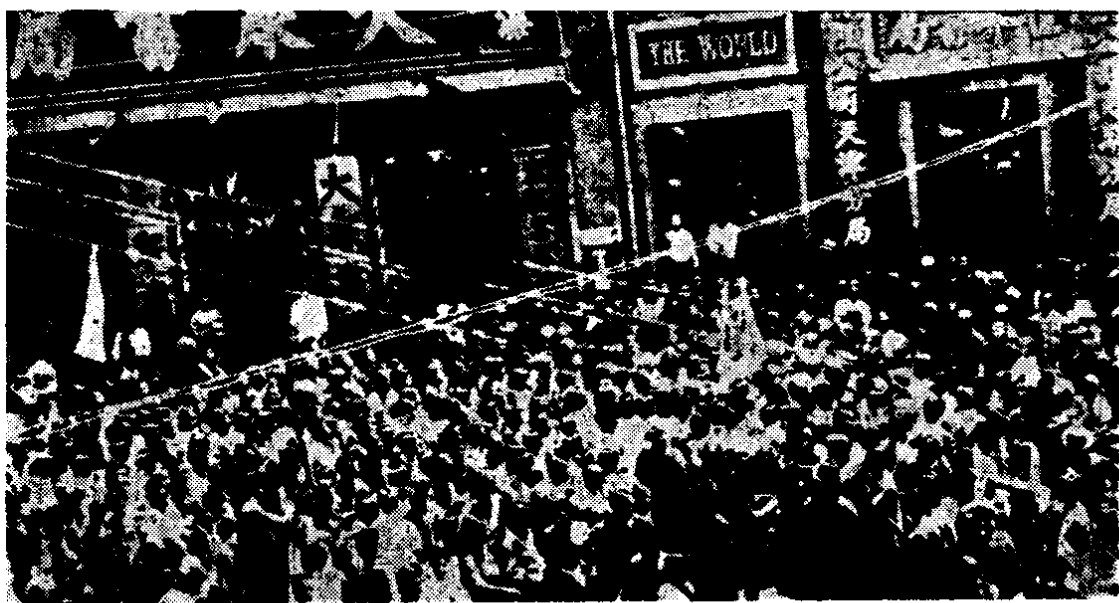
“五·二八”大示威

一九三六年五月，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形势发生了急遽的变化。

五月六日，日本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秘密签订了《华北防共协定》，规定二十九军退至河北省南部，日军进驻平津，消灭抗日运动等。日本帝国主义还将侵华日军天津驻屯军改为华北驻屯军，驻军由八千骤增至二万，进占北宁铁路沿线，企图不战一举占领华北大片领土。他们还在天津杀戮被迫为其修秘密军事工程的中国工人和郊区农民，沉尸海河……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五月中旬的一天，在刘少奇同志亲自部署下，中共天津市委负责同志林枫、易吉光、彭涛、李启华在天津西郊的一个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天津爱国学生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增兵华北，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供稿）

地主陵园里秘密集会。市委书记林枫同志传达了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根据天津当前形势，由于敌人的疯狂侵略，激起了广大群众高昂的抗日情绪，为了推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组织天津学生和各阶层爱国群众，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从而扩大党的组织和进步团体，壮大抗日革命的力量，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气焰。估计这一行动，会得到群众的拥护，甚至地方军警在抗日情绪增长下，很可能同情学生运动而采取中立态度，运动有胜利的把握。他们还研究了示威游行事项，并确定游行时间在五月底前后。

会后，市委的决定立即传达到各校党组织和各界救国联合会、学联会和民先的党组，由他们具体布置。他们还准备了两个总指挥，一个是公开的，一个是秘密的，必要时再公开。还